

当代青年自我塑造的另一种可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能

当前的日常舆论经常聚焦青年人中越来越常见的一种适应路径——“躺平”，其主要的引申含义是，青年一代中的很多个体放弃了在社会期待的方向上做持续投入的努力。“躺平”在这里既有停下来休息、暂时恢复体力的意思，又有暂时悬置重要社会角色的意思，同时还有一丝以“放弃高要求，接受低水平”为核心的“自我认可”和“自我接纳”的意思。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从生物学层面到社会学层面，再到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是当代青年人在社会语言学层面上最强有力的一个自我定义行为，而这种类型的自我定义恰恰意味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因此，要想探讨青年“躺平”的实质，就应该先对导致青年“躺平”的社会生态做一个解剖，尤其是对青年所面临的高竞争性环境及其直接心理学后效作一番审视，同时也要对每一个青年面对自己短暂生命周期内的地位变迁曲线所做的激烈心理调适过程有一个全面的感知。

容纳青年“躺平”的社会生态

容纳 (accommodate)，是一个十分具有能动性意味的动词，字面含义是有人来投宿，主人要供给他吃喝；在社会学里主要指的是一个社会性的环境/生态如何与一个具有特定社会特征的社会行动者的总体社会生命和社会实践相遇，并且以一种深具互动性和调适性的方式相互接纳、相互承载、相互支撑的一个社会过程。在当前语境下，面对青年一代生物学上的暂时休息、社会学上的角色悬置，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弱者的自我接纳”这种三合一的“撤退状况 (retreatism)”，能够以容纳的心态来看待的理由应该都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体所嵌入的机会主义环境所主导的，即结构性的趋势影响到了部分青年，因此，躺平是他们代际境遇的直接表达，而不是由各自碎片化的社会处境所架构和统驭的。

这一结构性社会生态的第一个维度是全球性的，可被归纳为全球范围内青年一代的结构脆弱性。在北美，它表现为诸如婴儿潮一代的年老各代，拥有比他们之后的年轻各代更优渥的财务地位（如更丰厚的养老金带来的安全感和保障感）；在日本，则是年轻职场人士在频繁并购导致产权日益全球化的时刻，遭遇了终身雇佣制这一内生文化的逐渐退缩；在全球南方城市，则是大学毕业生遭遇到了不稳定就业 (precarity) 的态势，由此产生了“愤怒青年”；在中国则表现为青年必须去处理社会流动降速这一核心问题，既包括了青年在住宅商业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压力，又包括他们在劳动力市场遭遇代内职位挤压的处境。前者使得他们很难承担得起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符的生活方式所需付出的财务成本（如以核心都市地带的高昂房价为例），后者则更加令人郁闷——职场中的直接上级可能只比自己年轻三到五岁，这一点与其父辈可以在职场中迅速占据重要岗位的势头恰好相悖。此外，他们 35 岁之前的收入成长曲线一直处于显著的平缓态势，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追求并维持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desirable lifestyle) 的难度。

除了全球青年脆弱性，在当代语境下谈及全社会对青年“躺平”的容纳，还必须考虑到当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结构性，即“啃老”文化所具有的中介和缓冲作用。所谓的“啃老”文化指的是当家庭日益小型化直至整个核心家庭变成一个包容亲子两代在内的单一经济单位时，两代间财务资源共享的一种状况。由于亲代相对于子代的财务优势，因此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单向的“啃老”（当然部分家庭也会出现“啃子”现象）。造成亲代相对于子代的财务优势的原因，主要在于 1990 年代末以来的住宅商品化过程中，亲代经历了一个相对显著的财富积累；此外，亲代相对克制的自我消费欲望也使得这一财富积累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本人的一个社会学判断是，中国的“啃老”文化不但确证了亲代的生命意义（一种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典型利他主义情结，即亲代愿意

为子代的社会成功铺路奠基做无保留投入的心态)，而且成为中国社会持续保持内部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社会机制。因此，“啃老”文化内嵌于中国家庭文化之中，成为支撑当代青年，尤其是出生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群体，得以实施躺平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当全球脆弱性遭遇家庭保护机制的时候，躺平这一适应模式应运而生。

结果工具主义化带来价值倦怠

如果结构性故事是沿着青年地位的获得这一脉络而展开的话，那么，青年何以陷入的“卷”的心理境遇？

中国社会传统上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保持着一种高亢的态度：儒家修身哲学的终点便是人力资源的外化效用（以内圣外王的“王”和治国平天下的“治平”为表征）。延续科举制度而来的高考制度为东亚世界的教育转型所接纳，这为东亚青少年打造了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制度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尽管全面人格仍然是价值观所追求的终极，但无论是家长们，还是身处绩效评价核心的老师和教育机构，均将升学结果看作最直接的评价标准。由此可见，在整个教育阶梯内，青少年的时间主权（决定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的权力）日益受到了升学目标的约束；鉴于时间主权对于青少年完整人格培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预见一个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即痛苦适应导致的病症化（躯体化）。对于那些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能力突出的青少年来说，可能问题还不大，但对于学习有困难、学力不足，或者学习态度和方式尚不到位的群体来说，学习落后于同伴且持续无法改变，就似乎变成了人生中痛苦和失败的一部分。

教育竞争加上职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异化，对于成长中的部分青少年来说，更大的代价在于结果工具主义化带来的意义丧失。比如，考入了名校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实习、找工作，竞争仍然持续，这支撑起了与躺平直接相关的另一种景观，即由“卷”这一最精练的当代梗语所表征的无法逃离的命运。当成功的定义被缩减为世人所谓的理想学校和理想工作时，意义丧失将可能逐渐导向价值倦怠，而“躺平”也许是源于此种价值倦怠的最直接的心理抵抗和心理防御机制罢了。

互联网时代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滋养

因此，如何看待青年的“躺平”呢？本人将其看作当代青年所采纳的自我疗愈行为中的一种，与社会性死亡、小镇做题家、佛系青年等网络亚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外部世界将青少年的某些特定行为看作失败的时候，自我赋予的意义则将某些尚未被主流世界接纳的实践看作控制感和效能感的自我供给。这就需要我们总体上对互联网亚文化实践做一个明确的定位：互联网亚文化不仅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地位获得的额外途径（如培育出并支撑起网红、直播主和 Up 主之类的创新经济行动者），由此开启了多样化的成功定义，还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如何面对社会角色失败之后的自我拯救的机会。通过互联网亚文化所带来的效能感供给革命，他们重新界定了多样化社会生存的可能性，并且为这些可能性注入了新的价值——选择、自我塑造和自我滋养。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如此评价“躺平”的积极性是否合理，甚至认为矫枉过正。当人们逐渐接纳了“躺平”，“躺平”文化的自我标榜也将会变得收缩、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其实，共存是人类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因此，崇尚积极性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系统，也要有容纳“躺平”这一看起来消极却具有自我拯救性质的心理适应策略的气度和胸怀。